

国际组织理论研究评析

孙 仲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由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构成的国际组织,作为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在现今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梳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国际组织理论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评析国际组织研究上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国际机制等与国际组织研究相关的最新理论学派,还有待于后人进行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机制

[中图分类号] D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1)02-0056-06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N Zho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include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as important non-national agent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cruci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by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marking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discussing new trends in the fiel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n-national agents; international regime

传统的国际政治以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然而,主权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①正如美国学者本尼特所认为的那样:只要没有一种既不同于主权国家,又拥有权力或手段,作出或实施能够影响大多数国家决定的机构,那么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②于是,17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组织这一非国家行为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应运而生,并在近现代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的界定,人们一般将国际组织定义为:“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该联盟是由其成员国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并且具有常设体系或一套机构,其宗旨是依靠成员国间的合作来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目标。”^③这个定义一般指的是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广义的和本文所指的国际组织还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民族解放运动、分离主义组织、恐怖主义活动、政府间的协议、国际公约、通用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也应包括进广义的国际组织范围之内。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增强和国际关系上人们相互协作与依赖程度的深化与细化,国际组织在20世纪得到了惊人的增长,以至于有人认为20世纪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组织的世纪”。仅从数量上来看,一战前夕,全世界约有5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7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到1940年,这个数目分别增加到80个和500个,而到90年代,这个数目已分别增加到300个与4600个,总

[收稿日期] 2000-06-30

[作者简介] 孙仲(1965-),女,安徽合肥人,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政治与外交的教学与研究。

数达 5000 个^[4]。中国从 1977 年到 1995 年，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 21 个增加到 49 个，加入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更是从 71 个猛增到 1013 个^[5]。国际组织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其活动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组织机构日益完善、组织规模日趋庞大，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网络和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等特点与发展趋势^[6]。

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如此“兴旺发达”，那中外学者对于国际组织这一日益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作了哪些有意义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并各自进展到哪一步呢？下面我们对此进行概要性的评析。

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内容较充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前期两次世纪大战期间，以美国“学者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人物的国际政治学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威尔逊著名的“十四点”及整个理想主义学派的目标是“预防战争再次爆发，改造现有的国际体系，使之和平稳定运转”。人们的思考焦点，不是经验的具体探索，而是确保和平转型的程序等技术问题。故“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力主要局限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方向上”^[8]。这批学者就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等问题都作了广泛的提示，提出了“国际体系是什么？如何使之运行”等一些高于普通人常识的“大范畴”，其覆盖面和论述角度都超过了前人，使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众多国际问题成为专业的而不是非专业的学术探讨领域。然而，此学派也具有以下的毛病：他们虽然就国际组织等国际问题做了许多规范化的布局和预见，但是缺少实证的精确的研究。他们的论述是某种思考力的纯化，但对问题思考的深度不够。他们具有一种模糊的使命感，期望世界“应当”怎样，然而却没有给现实世界发生的各种危机与矛盾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

20 世纪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出现，到 50、60 年代达到鼎盛期的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人物的现实主义学派，以“权力与利益”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对理想主义学派的“乌托邦”色彩进行了批判，然而他们自身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上也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对国家行为主体之外的各种国际组织的存在与影响要么完全忽略，要么低估其作用。这使得这一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对二战后国际间相互依存情况的加强和跨国行为的增加无法作出有力的解释。

传统现实主义受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崛起并风行的“行为主义”的强烈质疑。行为科学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从哲学、史学等古典学科中派生出来的理论思维方法，不够科学与精确分析。作为 60 年代后科技革命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体现者，行为主义学者主张研究方法要更“科学”、“量化”、“实证”与“可操作”，研究途径和视野要更加“扩大”。在有关国际组织问题上，他们批评传统现实主义忽视或肤浅地对待全球化问题。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莫顿·卡普兰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中，试图运用系统论来构造一个严格而精确的国际系统学说。在他提出的六个“国际系统”模型之一的“普遍制—国际制的系统”（the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system）中，卡普兰是这样来设计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行为体”的：“它含有一个政治学系统，可以向国家行为者和个人分配荣誉奖励……普遍制—国际制系统含有一体化机制，履行司法、政治和行政职能……国际系统所拥有的便利条件和资源比任何国家行为者的系统都优越，可以给欠发达国家行为者带来发展进步的希望。然而，这个系统可能会经历长期的不稳定，原因是它最初不能把各国内外的价值观念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系统中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家行为者不一定愿意对其政治、社会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无力为使该系统发挥效力作出必要的牺牲，因此希望把这个系统改造成等级制、两极制或力量均势的系统。”^[9]卡普兰等行为主义学者对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的认识与构想显然比理想主义学者要成熟一些：“显然，在卡普兰的时代，人们对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行为体’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尽管谁都承认它是履行国际法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主要机构，但没有谁像本世纪 20 年代的理想主义者那样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联’这类世界性系统的有效性和扩展性上。”^[10]然而，卡普兰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相当肯定的：“他的（指卡普兰）国际制系统是对加强联合国甚至建立‘世界政府’的声音的一种归纳。”^[10]他的对国际制系统的

种种详细设计可以看成是行为主义学者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存在及其运行规则的一种内涵上的扩展与丰富的努力。然而,由于行为主义者“只有方法,缺少理论”,并且纯粹的实证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其“机械”、“冰冷”等先天特点并不完全适用于国际政治等人文学科,所以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到70~80年代已被“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占了上风。

“全球主义”学者基于当时国际局势中冷战趋于缓和的事实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世界正在变小”(the shrinking of the world)的现象,提出应重视与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组织的令人感兴趣的新现象是,它们的存在与功能,使国际政治内引入了一种新的科层化、程序化、持续化和可预测性的现象。因此,人们现在至少可以小步地离开传统的国家间体系的无政府状况。”^[11]全球主义学者的强调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家的重要性正在逐渐下降、多国合作应该增强等观点的指出,开辟了不同于着眼点在于权力政治且一直占国际政治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新视野。

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全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把“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正受到动摇,各种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国际政治研究必须对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过程、各方参加游戏的动机及其整合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应该超越民族国家,注重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注重经济、环境和相互依存,而各种自主与半自主的国际组织的独立政策,可能与各主权国家的政府政策发生矛盾,抵消或降低后者的作用。应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崛起,是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层次的回归。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二极格局的瓦解,新自由主义上升为与新现实主义并列的两大西方国际政治主干学派,并且双方就国际组织和其他主题有相互融汇、接近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等西方学者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又有以下的一些新的进展与特点。

1. 对政府组织的认识更加深入。西方学者们认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冷战前是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冷战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转变,既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存在的必要性与活动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使它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而影响其职能的发挥。例如有以经济政治为中心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职能发挥上不如技术性强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倾向。西方学者的这种不是对政府间国际组织一味说好话,而是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并分析原因、研究对策的见识与态度,不仅在学术界具有认识论上的深化的进步,而且对政府决策也有实际的意义。

2. 继续拓展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与中国研究国际组织的情况相类似,西方学者传统上研究国际组织,也有重视政府间国际组织、忽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缺陷。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往往承担为国家所忽视的某个单一问题或某一系列问题,通过调动国内或国际公众舆论来对国家施加压力,因而对事物具有较强的责任^[12]。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学者已开始对这一新的领域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他们把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加以结合对照,指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相互兼容性与渗透性,这就不但从广度上加宽了研究范围,而且从深度上推进了研究境界。”^[13]西方学者还注意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它在政府间范围以外单独活动的潜力难以评估;又如存在着一旦政府间赢得相互信任,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专长将面临挑战等等。

3. 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一般来说,正如研究国际关系一样,多种研究方法也在研究国际组织的学术领域中被采用。”^[14]目前被采用较多的是两大类方法:比较研究法和体系与社会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源起于40~50年代,到现在仍属热门。“美国学者将比较研究的方法应用到国际组织领域,提出把历史的、法律的、结构/功能的以及决策分析四种研究方法并用,应该说是‘对研究的研

究以新的创意。这种研究方法是立体的、多层面的，而不是平面的、单一的。^{〔15〕}体系分析法与国际社会分析法在研究国际组织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可以说是交叉、互补的。“美国新现实主义者聚焦于国际体系，强调作为社会推动力的物质条件的角色，它决定构成这种体系的实体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英国传统主义者与数量增长的一批新制度主义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社会，强调国际制度的角色是国际水平上集体成果的决定因素。体系分析与社会分析两种分析模式截然不同，然而基本上是互补的。^{〔16〕}

4. 对国际机制理论的聚焦带动、拓展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自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把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后，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一词成为学术界和国际社会表述对转型时期国际关系规范模式的认知时援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各个主要学派也都根据自己的理论大框架给出了各有侧重的国际机制理论。到目前为止，最成气候的为以下三大家：强调国际相对利益和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机制论；强调国家的绝对收益和理性行为、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有较强约束力的新自由主义机制论；强调知识和认知在影响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约束力较强、重视研究决策过程的建构（认知）主义的国际机制论。专家预计国际机制论的发展方向是在这三大学派相互借鉴、吸收对方的长处的基础上，整合出一个更完善的新的理论体系。然而，无论中西方学者对国际机制的概念及理论都还争论不休。我国学者刘杰认为，根据人们能较为普遍接受的内涵，国际机制大致可界定为“在协调国家行为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制、原则、规则及其运作方式的有机系统安排”。^{〔16〕}而国际组织则是国际机制的基本载体或组织形式；绝大多数国际机制都依托国际组织来显示其存在，作为国际机制基本内涵的各种原则、规则、程序也都因国际组织而得到执行，作为国际机制实践结果的国际秩序也因国际组织的存在和积极活动才有实现的可能。^{〔16〕}从而国际组织具有论坛功能、协调功能、沟通功能、规范与管理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等“机制化功能”。^{〔16〕}可以预计的是，作为国际机制的承载者与落实者，国际组织将随着人们对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得到各方面的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中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上始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也相应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日益发展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研究中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

中国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对国际组织具体情况的介绍、对国际组织原则与依据的研究和对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三个不断深入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学者一般只作客观介绍、不作分析与评价。如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有关部门就翻译出版介绍联合国概况的著作等等。在第二阶段，随着对国际法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也被带动扩大到对国际组织的组织原则、法律地位等方面进行探讨。在第三阶段，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发挥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果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一广义的国际组织范围来看，中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和欧盟，近年来才开始较为关注非政府组织等。

从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学者研究国际组织具有多学科研究共同推进、借鉴与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的特点。例如系统分析法因其自身具有强大的解释功能和国际组织一般具有较完备的组织结构和系统的运作体系，而被中国学者较多地采用。又如关注重点在于不同民族国家实现联合必须解决哪些问题的一体化理论，也是中国学者在研究国际组织时使用较多的一个理论，并主要集中于研究欧盟。意识形态分析法和国家总体战略等理论也被采用于研究之中。应该说，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多元化研究格局。

然而,中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的研究从研究人数和成果来看仍然偏少,并且还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均衡问题:①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上,对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较少,更谈不上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②就具体的国际组织而言,联合国和欧盟几乎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全部对象,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甚至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组织)则往往被忽视。中国学术界对国际组织的理论研究总体来说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研究者的视野较窄,常常不能跳出国际组织本身去研究,并且过分依赖传统的国际组织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没有体现本学科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尚未找到深入研究的突破口与切入点,还有待于后人进行创新与突破^[7]。

综上所述,自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平面简单到日益丰富成熟的发展过程,不仅从国际组织的种类上已由政府间国际组织拓展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组织,而且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内涵、结构到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等内外两大方面进行了日益充分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经历了由单纯的中国传统人文质的分析法到分析、实证等“科学”量化方法的引入,到现阶段的比较研究及体系与社会研究方法应用这样一个由单一到“立体的、多层面”的进步过程,而且随着现在中外学者对“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聚焦与深入,对作为国际机制的组织形式与载体的国际组织的研究也将向新的纵深方向发展。当然,应该说在国际组织研究中,中国学者由于起步晚等原因,无论从研究的“质”或“量”上都尚不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相匹敌。但随着我国物质、社会、思想等条件的日益成熟,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学者完全可以在国际组织这一领域的学科研究上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成为世界学术界中有“中国特色”的、在学术实力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学派”。学术无止境,目前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虽然中外学者们已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还存在着许多未解决的问题、未开拓的领域,如“世界政府”是不是国际组织的最终目标?各种国际组织之间是否应该以及怎样才能建立协调的运行机制等等,众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还有待中外学者们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 [1] John Newhouse. Europe's rising Regionalism [J].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6). January February 1997,(1).
- [2] A. L. Bennet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Principles and Issues [5th edition] [M]. Prentice Hall. 1991 ,(4).
- [3]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Z] 1990/91(28th edition) :16 - 45.
- [4] Charles W·Kegley , Jr : Eugen R·Wittkopf. World Politics :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M]. New York : St Martin 's Press , 1993. 155.
- [5]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al Oksenberg edit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 Progress and Prospect [Z]. Introduction. New York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41.
- [6] 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110.
- [7] 王丽萍.中国国际政治五十年审视 [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22 - 24.
- [8]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A]. In Hugh C. Dyer and Leon Manganian (ed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State of the Art [C].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5 - 6.
- [9] 詹姆斯·E·多尔蒂 小罗伯特·L·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176.
- [10] 王逸丹.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6 ,118.
- [11] Donald J·Puchala , Stuart I·Fag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1970s : The Search for a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28), 1974 , Spring 252.
- [12] [美]A·M·克拉克.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J].国际政治研究,1996 ,(1) 96.

-
- [13] 高华.评价美国等西方学者论国际组织[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7):76,76.
 - [14] Werner J. Feld, Robert S. Jordan, with Leon Hurwi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raeger Publishers, 1996. 3.
 - [15]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 ,47] C]. 1995. 6 ,197.
 - [16] 刘杰.秩序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0 ,122 ,128 – 129.

[责任编辑 庄道鹤]